引领科举文化研究热潮 展示明代文学研究新貌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 卫 星

2008年11月11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武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等海内外近80所高校200余位学者与会,大会收到会议论文共计170余篇。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辅佐(助理)铃木阳一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先生主持。

会议先后共安排了两次大会发言和15场分组讨论,均是采用先主题发言后评议的方式进行。会议包括八个主要议题:明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个体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明代作家生平、交游研究;明代地域文学研究;明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关系研究;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之关系研究;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人别集整理与研究;文学视角下的明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200余位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全面反映了正在进行的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也集中展现了明代文学研究的新风貌。因研究成果数量较大,择要综述如下。

一、科举文化研究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科举文化的研究是会议讨论的重心。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介绍了其主持的大型出版项目“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和出版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关注。“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内容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第一批将要出版的书目包括《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等17种,共计约3000余万言,预计2009年上半年开始出版。陈教授将《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他在发言中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整理出版历代科举文献,“一方面是为了传承文化,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古为今用,让它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参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工作的有关学者罗积勇教授(武汉大学)、王同舟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王炜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余来明博士(武汉大学)等也分别在发言中陈述了相关文献整理工作情况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发现。

科举文化研究不乏热点,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小伟研究员的论文《关公:明清科举神》首次指出,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关公在晚明和清代曾被奉为科举考试神。南京大学周群教授的论文《〈四书大全〉与明代科举》认为永乐十三年编成的《四书大全》“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对明代科举、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赵伯陶先生的论文《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以“难以化解的矛盾”来总结士

人对八股文的复杂心态: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总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理想。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的论文《崇祯辛未进士科与吴伟业的负恩愧悔心态及其雅俗文学创作》认为明崇祯辛未进士科造成了吴伟业的报恩、负恩及愧悔的心态,并可见于其传奇与杂剧创作的实践。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教授的论文《科举考试对明遗民杜濬及其诗之影响》则以明末清初诗人杜濬为个案,分析了科举对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杜濬及其诗作、诗风及诗论的影响。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科举文学与“科举学”》界定了科举文学的范围,即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文章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扬州大学黄强教授的《〈游艺文规〉正续编的文学理论价值》、哈尔滨师范大学关四平教授的《唐代科举题材小说文化意蕴探微》、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教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的《明代科举对徐霞客游记成就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李舜臣副教授的《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等成果也对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明代文学研究

关于明清小说戏曲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当丰富。香港中文大学周建渝教授的论文《解构批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以解构批评的视野来解读小说中的曹操、刘备、魏延等人物,发现“奸雄”、“仁义”、“天生有反骨”等固有结论并不具有确定性。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教授的论文《天许斋小考》通过相关文献证实,晚明时期著名书坊天许斋斋主就是冯梦龙。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的论文《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探讨纪德君教授关于徐朔方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学术质疑,认为徐先生更重视考察这个漫长的动态的累积过程本身,而纪教授更关注这个动态过程的最后定点,两者结合才能有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程国赋教授的论文《论明代书坊对通俗小说体制发展的贡献》指出,明代书坊及书坊主促进了演义体小说的演进和定型,加快了演义体小说通俗化的进程。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的《〈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认为《金瓶梅》中的宗教描写是作者的精心设计,是作家用来表达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借此可以对作品更好地进行还原解读。此外,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许丽芳教授的《章回小说叙事之内在展现:以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韵文运用为中心之考察》、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的《朱权及其“二谱”》、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教授的《论“三言”“二拍”的时间操作艺术》、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教授的《黄向坚“万里寻亲”纪程与图绘探析》、湖北大学宋克夫教授的《情欲的正视与人生的警戒》、暨南大学王进驹教授的《论明代戏曲创作的“自况”现象》、上海财经大学许建平教授的《〈临清州志〉与〈金瓶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江苏教育学院冯保善教授的《论凌濛初的〈乔合衫襟记〉传奇》、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的《〈金瓶梅词话〉的欲望叙述》、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副教授的《遗憾、补偿与恶势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周艳博士的《欲望与诗:明代中篇传奇的题诗唱和与性别表现》等著也多有新见。

日本学者多从文献角度梳理小说故事情节或人物的发展演变历史,显示出一定的特色。日本宫崎大学上原德子的《关于刘东山的故事》将《初刻拍案惊奇》第3卷中的刘东山故事与其它多个版本的刘东山故事进行了比较,早稻田大学松浦智子的《“杨家将”故事形成史资料考》以山西杨忠武祠的文物资料为线索,考察了“杨家将”故事在杨氏家族内部的传承,揭示了杨家将故事的“世代累积型”发展、体系化的过程。早稻田大学岩田和子的《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考》以“蚺蛇胆”为中心,探讨了王世贞与杨继盛的关系、人物形象以及作者丁耀亢创作此故事的背景等问题。

诗文研究方面也不乏新论。复旦大学郑利华教授的《屠隆与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承传与变迁》以屠隆生平论诗主张为重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发展趋向。台湾中正大学许东海教授的《明代许讚及其〈华山赋〉之一考察》将《华山赋》所描写的人文风景和深层文化意蕴结合进行考察,说明其所承传赓续的西岳文化传统以及明代中期士臣的论述轨范。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的《明代嘉万之际的文学演变与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结合嘉万之际文学的演变来考察嘉定派的酝酿过程,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澄清。郑州大学李圣华教授的《论嘉定文派》、湘潭大学雷磊教授的《明初初唐派论略》、集美大学苏涵教授的《袁宏道〈徐文长传〉的文学批评意义》、集美大学王人恩教授的《〈题渊明小像〉的作者及其相关问题》、香港教育学院中文文学系郭伟廷博士《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考论》等也多有新意。

明代作家研究也受到不少学者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的《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从多个方面揭示了玉山雅会所体现的文人生存方式,并以此获得把握元明之际诗歌的实际特征与内涵之途径。山东师范大学石玲教授的《袁宏道、袁枚比较论》认为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与清中叶袁枚之间,在价值观念、创作个性、思想内涵方面有无割裂的承递关系。五邑大学孟祥荣教授的《公安三袁合谱》对“三袁”生平交游、事迹及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补充完善。漳州师范学院胡金望教授的《从〈和箫集〉看阮大铖早年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交游》、台湾岭东科技大学李栩钰博士《马湘兰相关问题探讨》、台湾中正大学翁燕珍博士《从〈戎旅赋〉到〈无闷篇〉》等也对作家生平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